

感悟和音容笑貌,有时无法用文字载之史册,而这些都是十分鲜活的珍贵历史资料。具有音像录摄等现代多媒体功能的口述历史则可以在这方面弥补传统档案、文献的不足,可以通过影像真实再现亲历者的情绪变化,从而让观众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因此,当我们看到抗战老兵诸如致敬或激昂慷慨演讲的画面时,我们心灵深处总能受到强烈的感染和震撼。

当然,我们在充分认识抗战老兵口述历史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要注意抗战老兵口述内容的真实性问题。最近几年来,我们也经常看到少数抗战老兵在接受媒体采访或出版口述自传时故意夸大或虚构历史事实。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左玉河认为:“要求受访者所讲的一切都符合‘客观事实’,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受访者有记忆上的局限,更要求访谈者和整理者大胆介入,用相关文献的补充与互证口述史料,纠正受访者记忆的失误。”这就要求我们访谈者具有专业知识背景,能对访谈内容进行考证纠错,同时,我们在发表、出版和利用抗战老兵口述资料时也要进行学术考证。

[作者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马晓娟)

抗日战争研究的新史料与新视角

陈谦平

去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明年是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抗日战争相关问题已成为近几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研究热点。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如何进一步深入?过往的研究中还存在哪些不足?在这一方面还应该开辟哪些新的研究领域?采取哪些新的研究方法?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思考与总结。

回顾以往的研究,笔者觉得,研究视角的宏大和多元更加重要。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使得中国战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我们应该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层面来认识中国抗日战争的重大意义。基于这样的视角,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正能量便能得到极大体现。日本在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是要实现其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称霸的目标。而中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局部抗战和七七事变爆发后的全面抗战,均有力遏制了日本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的战略企图,使得日本在亚太地区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受到延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中国各党派和各民族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浴血抗击日本侵略军。这样的认识,是从事抗日战争研究者必须把握的基本立场。也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过去影响抗战史研究深入的诸多困扰。我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纠缠于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之争,或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加以对立,这些都无益于阐明中国抗日战争之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全面、系统地研究抗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尽管学界对于这一时期的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缺乏更高层面的系统研究。尤其对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作为同盟国成员的中、美、英、苏的相互关系,还有中国战场同美国亚太战场乃至欧洲战场的关联等等,至今没有从国际战略层面加以考察。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中国政府在开罗会议与战后亚太国际秩序构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学界的重视还不够。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国收复南海主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抗战前后法、日对南海诸岛的侵略,学界的研究并不系统。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从1933年4月开始大规模侵占中国南沙群岛,中国政府对此行径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不断强调南沙群岛“为华人居住和历代属我”的史实。1936年12月10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奉命照会法国外交部,明确表示:“根据1887年中法越南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证明该岛属中国理由本极充足,此约应为中越划界最后之决定。”^①全面抗战爆发后,法国趁火打劫,于1938年7月初派兵占领西沙群岛。1939年2月,日军占领海南岛,旋即占据西沙和南沙群岛,将岛上法国人及其雇佣人员全部驱离。不过,日本肆无忌惮地占领南海诸岛并未引起法国的武装反击,英美等国也采取缄默态度。^②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南海诸岛主权属于中国,在当时就是不争的事实。1939年3月30日,日本政府将其所占领的西沙和南沙群岛合并为隶属于台湾高雄州高雄市的新南群岛。日占时期,南沙群岛成为日军侵犯东南亚的前进基地,潜艇基地、飞机场、电台、气象台、灯塔、浮标、修理厂等军事设施被一一设置其上。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的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同蒋介石共同构建了日本投降后亚太地区国际新秩序的框架。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黑兰举行会议。会前,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开罗会议内容,并将开罗宣言文本交给斯大林看。斯大林称他“完全赞成”“宣言及其全部内容”,并明确表示: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朝鲜应该独立,‘满洲’、台湾和澎湖等岛屿应该回归中国”。^③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④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根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中国负责南海各岛屿的受降事务。1945年8月中旬,南海诸岛日军撤至海南岛榆林港集中,候命遣返回日。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后,台湾省气象局于12月8日派员自高雄乘“成田”号帆船出发,先后登陆西沙群岛的林岛(永兴岛)、林康岛(东岛),并“植牌竖旗,以示西沙失土重归版图”。^⑤1946年8月,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报告:前高雄州高雄市管辖的新南群岛即为战前和战时先后被法国和日本侵占的我国领土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陈仪并报称,“本省光复后将该群岛改划高雄县管辖,并准备本年四月间前往接收”,但因新南群岛原为西沙和南沙群岛各一部分,故而请示行政院该群岛“是否仍由本省接管”。该电报还附上了台湾省气象局撰《新南群岛调查报告》和《新南群岛概况》的日文译件。^⑥国民政府对台湾的接收,从国际法角度讲,连带完成了中国政府对其所管辖新南群岛(即中国南海诸岛)的接收,行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胜国收复被侵占领土的权利。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依约收回了被日本侵占的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和南海诸岛,确定了中华民国新的版图。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和同盟国赋予中国的权利,更是中国在战后国际秩序下(即“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享

① 《中国驻法大使馆呈外交部》(1936年12月10日),《南沙群岛(中越部分)》(1956年6月9日—1959年11月1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11-EPA-04141,第200039页。

② 《顾维钧呈外交部》(1939年4月1日),《南沙群岛(中越部分)》(1956年6月9日—1959年11月1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11-EPA-04141,第200057页。

③ Foreign Relations 1943, Conferences of Cairo and Teheran, N. 10 (Washington: GPO, 1962), p. 869; 梁敬鏞:《开罗会议》,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49页。

④ 《王宠惠呈蒋中正开罗会议日志(附政治问题及军事问题上谈经过)》(1943年11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20300-00023-021-042。

⑤ 韩祥麟:《军史一页——抗战胜利海军收复南海诸岛》,高雄,《海军军官季刊》2004年第3期。

⑥ 《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致外交部代电》(1946年8月17日),《南沙群岛(接收团沙群岛)》(1946年7月—1947年4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交部”档案,11-EPA-04152,第202857—202859页。

有的权利。

其次,应该加强对于抗战新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抗战相关的史料,除了海峡两岸的档案机构有大量的收藏外,美、英、俄、日、德、法等国的许多档案馆和图书馆也收藏丰富。中国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对于这部分档案与文献资料的挖掘与利用还显得着力不够。当然,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外文档案和资料的运用存在外文水平的限制,这就需要更多懂得日语、俄语、德语、法语以及其他各种语言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抗日战争研究的行列中来。最好可以将收藏于各国的抗日战争史档案与文献资料译成中文出版,俾利于更多学者运用。

新史料的发掘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至关重要。学界对于抗日战争史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空白。例如,中国的战时易货贸易对于抗战的支持巨大,因为战时苏联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大部分都是靠中国出口农矿产品来偿债的。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抗战期间援华最力者为苏联和美国。但迄今为止,苏、美、英对华援助价值几何?学界尚未有权威的数字。中国抗战得以延续,战时对外贸易的功绩不容忽略。这期间,中国以蕴藏丰富的钨、锑、锡等战略矿产品和欧美急需的茶叶、桐油、猪鬃、生丝、羊毛等农副产品对外出口,换回大量军火、燃料、机器设备,构成了抗战时期中苏、中美、中英易货贸易的基础。据档案资料统计,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借款,计有中英第一、第二次信用借款及中英财政协助协定拨借购料款共 2850 万英镑;中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借款及中美 5 亿元借款拨借购料款共计 179389927.84 美元;中苏三次借款共计 2.5 亿美元。截至 1945 年 9 月,中国政府共计使用苏联易货贷款 173175810.36 美元、美国易货贷款 177844657.04 美元、英国信用贷款 8055406 英镑。其中美国提供的贷款全部用完,苏联第三次借款的 1.5 亿美元中尚有 76824189.64 元未使用,而英国对华贷款中尚有 20444594 英镑未能使用。^①这一组数字实际上也是体现战时中美、中苏、中英关系的晴雨表。

此外,我们还应加强对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研究。总体上看,沦陷区研究基本上没有开展,尤其是从东北四省到平津冀鲁、长江三角洲直至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相关研究还很薄弱。日本是如何在中国这些富庶的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日本占领当局如何利用这些地区的经济资源为其侵略战争服务?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譬如东北地区,这里一直是日本殖民开发的重点区域。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政府通过 10 余年之经营,竭力开发东北资源,将其变成日本在亚太地区扩张的最重要的工业基地。日本占领当局打着所谓“日满一体”的幌子,将中国东北纳入日本国防及国民经济当中。其采取公司专营的办法,先后于 1933 年和 1937 年通过伪满政府制定的《经济建设纲要》和《重要产业统制法》,指定液体燃料、煤、铁、钢、铝、镁、金、铅、铜、纺织、面粉、雷达、肥料、水泥、飞机、汽车等 20 余项产业归特殊公司专营,这些特殊公司的收支及盈利均受殖民当局严格统制。1937 年实施伪满洲国的第一次五年计划,起始投资 26 亿“满洲国元”,1938 年又扩充至 50 亿“满洲国元”。使得伪满洲国的生铁产量达到 500 万吨、钢材产量 200 万吨、电力 260 万千瓦。1942 年起又实施第二次五年计划,特别注重铝镁等轻金属之制炼、汽油之生产、硫酸铍及制氮工业之发展。到 1943 年底,东北地区每年可产铝 1 万余吨、原油一百数十万吨、硫酸铍 40 余万吨。这类特殊公司包括满洲重工业开发会社、自动车公司、轻金属公司、合成燃料公司、电化工业公司、昭和制钢所、本溪湖煤铁公司、电力公司等。^②这些数字凸显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战略资源的掠夺和消耗,更展

^① 《贸易委员会邹琳呈贸易复员计划》(1945 年 9 月 22 日),《战后贸易方案》(1943 年 2 月 24 日至 1946 年 5 月 17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1100.03/6322.01-01/31/001110003A005。

^② 参见《翁文灏呈报调查日本在东北四省经济建设等情形》(1944 年 1 月 24 日),《东北经济》(1944 年 1 月 24 日至 1947 年 8 月 12 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200000000A/1100.01/5011.01/26/001110001A001。

现出抗日战争对于在战略上遏制日本扩大侵略战争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此外,对于日本占领当局在华中和华南地区的所谓“开发”,也应该开展系统研究。因为沦陷区研究亦是抗日战争史研究非常重要之一部分。

[作者陈谦平,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郭阳)

区域抗战史研究需有更宏观的视野

袁成毅

抗日战争前后持续14年,涉及中国国土的大部分地区,根据战后国民政府的统计,全国人口80%的地区均遭日军破坏蹂躏。^①由于战争时间长,涉及地域广,无论是从日军侵略的角度还是从中国各地抵抗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区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除了整体的宏观研究和专题研究外,专门针对某一区域的抗战史研究也同样十分重要。近些年来,伴随着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热潮,有关区域抗战史研究也受到各方面重视,产出了不少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抗战史的内容。

由于区域抗战史将研究范围限定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或行政区域,这就必然产生一个区域与整体的关系问题。在当下区域抗战史的不少论著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研究并没有将一方区域抗战的史事置于整个战争的全局中来把握,往往就事论事,鲜见区域与整体的关联,致使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处于一种“碎片化”的状态,或者说仅停留在地方志的记述层面,因此,区域抗战史的研究必须有更为宏观的视野。

一、宏观视野不是简单套用“三阶段论”

毛泽东在1938年所著《论持久战》中将中国的抗战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一预判也基本上被后来战争演进的过程所证实,尽管学界对于中国战场是否存在一个单独的战略反攻阶段尚存争议,但总的来讲,就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或者全局而言,“三阶段论”的叙事模式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个阶段只是对中国全民抗战从整体战略的角度所作的划分,它绝不意味着各地的抗战史都经历了三个阶段。事实上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作为区域抗战史的研究若简单套用三阶段来叙述,很难展现该区域抗战的真实面貌和特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为例,实际上是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才开始大规模遭到日军轰炸,成为战争的重灾区。在这一地区,从1938年到1941年间日军一直处于航空作战的进攻态势,中国方面完全处于守势,至于中方发起的反攻作战,这一地区则又早于国内其他地区,因为自美国空军开始援华助战后,从1943年实

^①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4),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4页。